

在目前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军旅作家中,王凯的小说写作出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倾向,这一倾向可能是军旅文学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征兆,尽管还有待继续观察。

在诸如《终将远去》《对白》这样一些小说中,这位年轻的作家都把焦点放在了人的主体地位、自我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自我选择方面;同时也涉及到了个体对权利确认、对责任承担的勇气这些重要的东西。说起来,这是个已经有点老旧的问题了,也就是所谓启蒙思想的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浪漫主义的“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意味着现代主体的诞生,意味着主体性意义上的“人”的存在。这样的主体,既与自我实现相关,又与社会历史相关,而作为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正确反映,则体现为与现代主体相关的意识形态,自然也包括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发生发展。只是,在功利和实用特点占优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今日市场神话烈焰的炙烤下,启蒙与浪漫的苗头总是容易失去生机,而往往代之于一种以消费和娱乐为实质的大众审美。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小说在一夜之间退回到其兴起伊始的近代面貌,也就是集街谈巷议、轶闻志怪、稗官野史和惊堂木于一体的引车卖浆者水位,是非常容易的。

如此的话,由鲁迅等先驱们所建立的现代文学高度,可能会被轻易放弃,中国当代文学基于古典精神、浪漫气质和批判现实主义力量的那个脆弱传统,可能会被遗忘。这种情况下,对人的价值问题、自我抉择问题和人的社会存在问题以及责任承担问题的重视,就显得依然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当这种经由文学表达而实现的理想价值诉求,是出自一个军人作家之手时,更值得尊重。

在中篇小说《终将远去》中,王凯对一个小小连队里发生的许多复杂矛盾并不避讳——放大来看,围绕年终士官复选改选而出现的一系列困扰,其实就是某种瘟疫般无处不在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的写照。不过,王凯坚持将矛盾置于人物的内心,也就是连长、指导员这样的当事者的个人立场当中。如此,作品呈现出更多他们伦理、道德选择的内在困境,而不是把所谓的负面现象、消极内容留给读者。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个体如何面对并处理自己的内在矛盾,如何承担自己那一份天职,他们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偏向何方?这才是这部作品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文学走向对光明人格表达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主人公的困境在于,如何才能把那些真正对部队有用的人才保留下,而将那些到部队只是为了稳定工资的庸碌之辈淘汰。其中就包括了军事素质优良的士官李峰和前任连长张安定的外甥周文明。

小说的一个关节点在于,数年前,前任张安定病危时,曾在病床前托付即将前往自己故乡接新兵的现任连长韦佳节捎1000块钱给他的外甥。韦佳节在把装钱的信封揣入衣袋时,触碰到一张写有旅里几个领导交办名单的纸,按照“惯例”,名单上这些或为亲属关系、或为战友子弟、或其他与部队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年轻人,都会受到关照被接到部队上来。他突发奇想,向张安定提出将其外甥也接来当兵。因为他了解张安

重启“问题意识”

——对王凯小说的一种解读

□殷 实

定的姐姐一家生活困窘,姐夫长期酗酒,欠了不少债,靠外甥打工维持家用。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张安定的反对。这位在个人利益和军队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头脑清醒的基层军官如实告诉韦佳节,自己的姐姐也多次向他提过这个事,但他外甥只上过三年小学,“文化程度太低,来了只能给部队添麻烦,部队是要打仗的,要的是年轻有能力的人”。韦佳节没有听张安定的意见——张很快就去世了,还是将其外甥周文明接到了部队,作为对自己敬重的亲属家庭的一种抚恤。但他同时也意识到,“我在满足自己私人道德欲望的同时,背离了我作为军官的职业精神。”这个矛盾纠缠了韦佳节多年,因为事实证明,确如张安定所认为的,周文明生性懦弱,反应迟钝,又受限于文化教育程度,不要说电脑操作和新装备使用,就连车辆驾驶技术也掌握得极其困难,无论韦佳节如何帮衬,都是恨铁不成钢,在连队里,他能够做得最出色的事情,就是油炸馒头片。他必然是在受惠于优厚物质生活条件却无从作出贡献的情况下寄生在军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从对张安定到韦佳节这样一些人物的塑造,我们可以观察到,王凯所在的意,并不是如何对不如意的现实进行简单摹写,而是要发掘乃至塑造心灵的独特样式,从而展示出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推而广之也包括某种军旅人生、军旅色调之美。如果说小说写作意味着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在这点上,《终将远去》正是对这样的可能性进行了饶有兴趣的探究。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连长、指导员这样的“芝麻官”坚持之下,军事素质占优的士官李峰被排在了留队改选名单的前列,另一个“有办法”的关系兵则因为连队党支部的明确反对立场而不得不调动到另一个单位留队改选。韦佳节甚至顶着再一次辜负张安定家人的负疚感,决定了周文明的离去——最终由上级确定的退伍名单中,既包括了周文明也包括了李峰。但是,掩卷以后给人的感觉是,这种对有问题的,甚至是极为荒谬的现实的揭示,并没有消弭作品对健康心灵、光明人格的凸显。

这样的文学表达的结果是,读者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什么丑陋肮脏的社会现实,或者存在于军营中的歪风邪气,而是人心向善的一种驱力,是人自我净化的“挣扎”,是生命境界提升的内在需求。读罢作品,读者同时也会跟随,进入追问、检点和判断的“程序”。所以看《终将远去》这样的小说,你可能会觉得结局让人遗憾,整个作品的氛围都让人惆怅,让人惋惜,但不会令人义愤填膺、愤世嫉俗。如果说“人是人的最高本源”的话,那么王凯小说中的张安定、韦佳节,其实就是具备了“理性人”特质的现代主体,也就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人”,趋

向于自我实现的“人”。世故的看法当然会认为,这样的“人”太天真、太幼稚,甚至不可信。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去为之奋斗、也值得为之去实现的“人”的理想呢?同时,小说通过展示一种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在朝向其“最高本源”努力时受困于其中的社会存在,让我们体味到的是丰富的历史内容。具体一点说,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国民性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以及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作品的文学内涵因而被大大地扩展了:曾几何时,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我们这样一支军队会为之流血牺牲的那个社会价值理想,不正是为了这样的“人”的目标吗?

这篇小说中还涉及到一个主题:当前部队选人用人中“民主测评”形式的漏洞问题。如前所述,李峰是无论如何都应该留队的优秀士官,“加注专业一号手到五号手的技术没有他不通的,特别是故障排除,连里的技师甚至旅装备部的高工都未见得比他强。即使是这样的兵,民主测评分数也一般——他以二级士官的身份代理排长,不得罪人也不现实”。结果他“顺理成章”经由测评而处在了一个不利的地位,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大概由于名额限制之类原因,最终他还被上级确定列入了复员名单。我们大约都知道,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传统中,是有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这样一些重要法则的,其积极作用从来都毋庸置疑。选人用人中的“民主测评”则不过是这些传统在今天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就本意而言,这样的法则的贯彻,与确保军队履行使命的终极目标相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作品中和现实中都会观察到的,在一个主体意识、主人翁精神发育远不够成熟的社会(军营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很难显现出民主的真正价值。换言之,在民主基础还相当脆弱的情况下,当施行民主权力者往往并非“理性人”而只是一些患得患失的利己主义者时,民主的结果就不可能乐观。

在短篇小说《对白》中,出现了相似的主题: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军队里的小帮派、小山头,还有同乡之类的陈旧关系结构该如何面对,又该如何去除?连队司务长撤换,最合适的选择者似乎是一个叫做“老马”的人,副连长和一位排长也一致推荐这个人。问题是,“老马”增补进来以后,连队党支部支委成员之间就会出现微妙的结构改变:五个支委中只有三个是关系密切的老乡——副连长和那个排长与“老马”是同乡。指导员冯勋明白,站在连队长远建设的角度考虑,副连长和那个排长的提议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老马”的实力摆在那里,却也担忧,今后支委开会做什么决定的话,会不会出现意见一边倒,甚至自己和连长被架空的情况?《对白》的出人意料之处在

于,“老马”虽因这样的顾虑一时未能被增补为支委委员,但在接下来的上级考核中,他并没有在关键时刻赌气撂挑子,而是以一个老兵的觉悟出色地承担了任务,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人格问题再次成为作品珍视的首要内容。

王凯小说中的这类表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曾经作为“问题小说”而引起过评论。由作品中的问题意识,延伸扩展到作品之外的社会变革与发展问题,引领批判和反思,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一度是良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对当时军队与社会现实的深刻表达,就是极好的范例。该作品既撞击人们质朴的情感世界,也挑动社会阶层结构的微妙变化这一敏感的“政治”神经,实现了文学思想与当下社会现实的融合。但这样的努力似乎并未受到鼓励,同时期甚嚣尘上的各种虚假英雄主义、提虚气和装模作样的硬汉文学,以及后来满地鸡毛的“农家军歌”,很快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一个更可悲的事实是,从那以后,无论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还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已经不再关心军队作家或军旅文学这回事了。

王凯小说中隐含的这种问题意识,实际上既关乎现代主体的重建,也关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建,这意味着任务是双重的:现代个人、现代主体的重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密不可分,这当是在个人层面强调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在社会层面呼唤公民立场、集体思想,完成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人文发育,建立起对知识、思想、信仰和生命价值理想的共识。具体到文学表达而言,可能就是对人性有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对社会抱持更加多元化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有深刻反映,对社会文明的具体意涵有积极的理解,对人类家园、共同体命运有强烈关怀。

文学中“问题意识”的重启,或者说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建,首先涉及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问题。现实主义精神之要义,即在于文学的现实批判和社会批判功能,通过这种批判而建立的价值系统、意义系统,是文学最终完成其审美旨趣重要步骤之一,不管传统文学思想,还是现代、后现代文学观念,好像都离不开这一点。所以,现实主义精神也可以说是相对于文学的对象世界、经验世界而言的一种理性态度和理性能力。放弃理性态度,或者理性能力匮乏,对社会现实没有思想照耀,文学的社会功能自然会退化,文学的社会地位自然会被边缘化,这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不仅如此,现实主义精神的严重缺失,还导致犬儒主义盛行,面对随技术和资本的扩张而被无限放大的欲望,面对消费社会的商品崇拜所制造的巨大信仰黑洞,抑或面对官僚社会的僵化、异化和腐败,面对人的降格与堕落,文学基本上无能为力。

王凯的写作启示我们:当代文学如果想要继续获得尊严和价值,就必须正视今天的社会现实,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作出深刻表达,而前提可能是重新思考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命题:启蒙、启智、批判的力量、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情怀,这些缺一不可。军旅文学亦复如此。

7号高地奏鸣曲

——西元中篇小说《死亡重奏》赏析

□吴平安

一个志愿军连队奉命扼守一处高地,在经历了8天8夜的阻击战后,除一名小战士存活外,包括数次补充的兵员在内全部阵亡。不难看出,在我们丰富的战争文学积累中,西元锁定的只不过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他既无意于展开大兵团作战的恢弘,也无意于描写小分队游击的传奇,而这也正是以往战争文学津津乐道的套路),进攻——阻击,进攻——阻击,如此而已。

在一部中篇有限的体量里如何拓展小说的格局,关键在这场阻击战的意旨能否突破单一英雄主义的讴歌,或者说,以一场阻击战为触发点,如何扩充小说的幅度,抵达小说的纵深。与此内容追求一体两面的,是叙述上怎样颠覆一场战斗全过程惯常的线性叙述模式——甚至以诸如插叙、倒叙之类的手法,也因其陈旧而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线性叙述的呆板。明乎此,叙述形式的苦心经营便是当然的。西元在这两个维度上,显示了自身良好的小说家素质。

这部题为《死亡重奏》的中篇,“死亡”是文学向哲学的靠拢,“重奏”是文学朝音乐的越界。正如一部交响乐或奏鸣曲的主题常在开端呈现,而后在整个作品不断展开中徐徐显示其全貌那样,小说简短的前奏,“你把苦难强加于我,我把苦难变成武器”点醒了作品蕴涵的深意。序章开篇,是为全文奠定基调的章节,这一基调给读者的冲击力是极为强烈的,这种冲击力来源于“战壕里的真实”。熟悉当代文学进程的读者知道,这一术语系舶来品,它来自前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依据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事伦理,“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是战争文学的基调,于是在以往的革命文学中,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便谱写出一首首激昂的凯旋曲,即便是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也演化为犹如宗教祭般的仪式。延至今日,娱乐文化改写之下的战争景观,形同端出一锅锅以战争为底料,融武侠、言情、魔幻、偶像为一炉的杂烩,战场无非秀场,参战则几无异于参加一场party。

放在上述背景下,这部充满了伤残和死亡场面的战争小说,其反拨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淋漓尽致地状写了以往讳莫如深的“战壕里的真实”,不惜采用慢镜头加大特写的电影技法,放大弹丸和弹片或穿透或撕裂人体的时间和空间,定格战壕里的血腥和残酷。只要看看这些文字,“连长的下半身跌坐在手榴弹木箱上,血肉之花露出几节又红又白的脊梁骨,肠子像一捆胡乱缠在一起的粗麻绳,摊在腰上,腿上,有一节垂到了雪地上,某个器官似乎还未完全死去,慢慢地、顽固地蠕动着,每动一下,便有一大股血冒出来……”这还不够,再看,“连长身后的战壕

壁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碎肉、牙齿、半块耳朵、几缕头发,还有布头、铜口子、军衔,啪的一声,一只乒乓球大小的白色眼珠子,从布满血浆的战壕壁上落下来,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战争这一人类相互厮杀的怪物的狰狞与凶险,在西元笔下获得赤裸裸的呈现,以至于不仅能够引发读者心理上的反应,甚至可以引发出生理上的不适感。就小说描绘的战争画面来说,倘若倒退若干年,是会被目为自然主义的,必须承认,它无疑更逼近战场的原生态。

不过这一文本呈现的美学资源,却不妨归结到现代派文学的营养。

我在阅读《死亡重奏》时,常常联想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联想起闻一多的《死水》,联想起莫言的《檀香刑》,

经历了西方现代主义洗礼的中国小说,

其面目已经与传统写法大异其趣了。除去美学的、文学的学养之外,军旅生活历练中获取的兵学、兵器知识,是西元作为战争小说家的强项。正面地而非侧面地、细微地而非笼统地描写一场战斗的始末,这一知识储备是不可或缺的硬件,非军旅作家写作战争小说,常在这一环节露怯,要么只能虚写,要么出现细节性失真,原因盖出于此。当然,对于同样没有实际战场经验的作者来说,必须借助的想象力是另一种功力,这其实对所有的小说家都概莫例外。

在依次展开的几个乐章里,小说的几个人物依次登场。西元是一个善于书写极端环境的作家:“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连长魏大骡子,逃荒路上的凄惶和母亲的死亡与安葬是一种极端环境;“榆木脑袋”的河南农民上官富贵,遭遇到了大旱凶年是一种极端环境;秦淮河边长大的文书王尽美生于书香家庭,与连队其他官兵的背景有很大反差,却是一个从日寇大屠杀的浩劫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那又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将这些极端环境淋漓尽致地凸显出来,作者采取的同样是慢镜头加大特写的电影技法。从东北到中原到江南,从农村到城市,若干事断续的镜头将各自的极端环境显现出来,不同的只是地域色彩,苦难却是共同的。这些章节丰富了叙事内容,超出了眼前的阻击战,却与这场残酷的战斗有一种内在的因果链接。那些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不会理解在炮火、严寒和饥饿摧残下已所剩无几的“野蛮人”,何以“还不命令他们投降”,因为他们不了解更无从体验这些对手背后的苦难,不理解“你把苦难强加于我,我把苦难变成武器”的决绝,当然更不会了解由柳公权楷书引申出的那个“骨”字,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数千年不倒的精神支撑——作者并非偶然地在开篇即寥寥数语,写到同样是“柳公权的楷书写

绘本在西方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传入我国,却只有十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中国原创绘本都亟待拓展。比如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在西方有《铁丝网上的小花》《敌人》《大卫之星》《安娜的大衣》《欧先生的大提琴》《爷爷的墙》等。这些作品以人道主义视角审视战争,展示战争给人,尤其是孩子造成心灵戕害的同时,也表现了特殊境遇下人性人情的温暖。我国的原创绘本中,有关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探讨,相对较为匮乏。

“和平鸽绘本丛书”(包括《南京那一年》《天使》《家书》《皮箱子》《不死鸟》《虎子的军团》《我们的抗战》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匮乏,以不同于以往军事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崭新视角,呈现出鲜明的艺术追求。

以儿童视角审视并观照战争,表现战争背景下的儿童生活以及战争给他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是“和平鸽绘本丛书”鲜明的艺术特色。与以往表现战争中儿童生活的作品,如《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鸡毛信》等所不同的是,“和平鸽绘本丛书”中的儿童,多是战争的被动承受者。他们是在一种懵懂的状态下卷入战争的。在《虎子的军团》中,“战争”给虎子最深刻的印象是其乐融融的童年戛然中断。在盼望爸爸来信的过程中,他丝毫没有想到,战争会给他们这个家,给爸爸的命运带来怎样的转变,可一切的一切却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抗战》中,作者以颇富张力的节奏,通过战争给“我”的家乡带来的变化、八路军阿姨的到来、妈妈为八路军阿姨牺牲这几个转折,表现战争的沉重和妈妈牺牲的壮丽。《天使》将中俄边境小城的绚丽与战争阴云笼罩下人们心情的沉郁融为一体,在揭示加丽娅自我牺牲的行为契机的同时,展示加丽娅作为普通少女顽皮、任性的一面,如,她趁着妈妈熟睡,偷偷溜到妈妈卧室里,戴上妈妈的红头巾,在黎明的河边歌唱,惟其如此,她的牺牲才格外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不仅如此,《天使》还通过高仓智子的形象表现了战争给日本儿童造成的心灵戕害,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思考战争与儿童的问题。《皮箱子》以一个“皮箱子”的自述,表现一个家庭在战争中的流亡以及战争给儿童造成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在这些作品中,儿童都是需要呵护的对象,他们不希望却又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战争中,战争也在他们心灵上留下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他们也不得不在战争中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

对战争中的人性、人情的揭示,是“和平鸽绘本丛书”的又一重要特色。《皮箱子》中,两个孩子历经战争磨难,但还是“有了一个新的家”,结尾处,养父养母一个手里拿着玩具,一个拿着新衣服,笑容可掬地看着他们。再往前翻,一男一女在水中游向两个孩子的夫妇,就是他们的养父母。这毕竟是这部悲剧色彩浓郁的绘本中的一抹亮色,向孩子们展示了人性的温暖。《不死鸟》中两个鸽子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它们在自己的天空自由飞翔,以及它们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都展示了人与自然、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同样充满了人性、人情的温暖。将战争中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家书》了,一纸

小小的“家书”,连接着祖孙三代浓浓的亲情,尤其父亲在战场上画未曾谋面的儿子,儿子又画了一辈子从未谋面的父亲的情景,让人顿生浓浓的暖意。情感浓郁而又含蓄蕴藉是这部绘本的魅力之所在。在《虎子的军团》中,作者将父子两代人的浓浓亲情,借助木头玩具“兵士”得以传达。爸爸要上前线了,连夜给儿子削了一个木头玩具,爸爸走了,“兵士”陪伴着虎子,及至爸爸受伤,寻找爸爸的路上,“兵士”的腿受伤,隐喻爸爸的腿也受了伤。故事结尾,兵士的“腿”好了,可爸爸却借助双拐和虎子、妈妈回到家。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爸爸虽然不能再上前线征战了,他却送给虎子一个用木头玩具打造的“战地兵团”——父子亲情与军人的家国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使这部绘本于情感的传达外具有了深邃的哲思。言有尽而意无穷,是绘本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和平鸽绘本丛书”的美学特质。

战争对美好的毁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套丛书的领衔之作、大型史诗绘本《南京那一年》,以一座城的美好与毁灭完成了对战争残酷性的揭示。八位居住在南京的作家、九位画家和一位历史学家共同完成一部绘本,本身就是一种姿态,这是作家、画家和历史学家们对他们居住的这座城市曾经的创痛和历史屈辱的共同发声。在艺术传达中,创作者们将愤懑的情感熔铸于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将1937年的“节日”作为这部绘本的主角,随着战事一步步逼近,绘本的主色调由绚烂转向沉郁,在叙事上由对南京民俗风情的揭示而转向对战事的渲染与描绘,直至最后一页,作家叶兆言的文字和画家周翔的绘画交相呼应,将这部绘本的情感推向高潮,也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悲剧的美学力量。在这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绘本中,没有血腥与暴力,一切都隐到幕后,随着画页的翻动,读者更多领略到的是一座城市的美好与美好被毁灭的惨痛,创作者们给读者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天使》也将战争的惨烈推到幕后,把加丽娅的牺牲加以浪漫主义处理,“有人说,她变成了天使。每天早晨,她都在小城上空歌唱。”最后一幅画面,花开了,草绿了。从点缀着一簇簇花朵的无边无际的绿色中,隐约可见加丽娅的红头巾在飘荡,这也预示着作为“和平天使”的加丽娅精神的不朽和她身上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永恒。

“和平鸽绘本丛书”以西方优秀绘本作为参照系,以人道主义情怀作为切入点,从各个方面表现战时的儿童生活,以符合儿童审美特点的艺术表现方式,揭示了战争对儿童心灵的残害,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对于中国原创绘本的题材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拓展;对于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事实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绘本,本身就是一种姿态。过去的战争与硝烟虽然远去,但作为一种警示,必须深深镌刻在每一个公民的心灵深处。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让他们了解我们民族曾经蒙受的灾难与屈辱,以时时警醒,树立公民意识与国家意识,是儿童教育工作者们刻不容缓的职责。这也正是“和平鸽绘本丛书”的意义之所在。

绘本里的战争与和平

——评《和平鸽绘本丛书》

□张 鹰